刘智《天方性理》的主旨及影响

季 芳 桐
(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摘 要:《天方性理》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心性问题,即人如何通过心性之功修而复归真主的问题。《天方性理》自刊行不久,便从学者群传至普通穆斯林大众,从穆斯林社会传至主流社会。《天方性理》之所以能在全国获得普遍认同,在于其理论的精深性、动态性、通俗性,也在于其体现了明清以来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的最高成就。

关键词:刘智;《天方性理》;心性;回儒
中图分类号:B9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 6627(2014)04 - 0099 - 07

刘智的《天方性理》自刊行至今已经 300 多年,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涉及面越来越宽。本文主要探讨其在清代之影响,即从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著作完成以后,至清朝覆灭(1911 年)。

一

《天方性理》刊行以后,国内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于今天之探讨仍有不少启迪,然尚有一些领域,需要继续深入,其中最重要的是刘智的心性理论。不夸张地说,心性理论是《天方性理》的核心或主旨,只有深入研究,才能准确地诠释刘智的思想理论。

《天方性理》共有五卷。卷一、卷二,主要阐述大世界,即自然万物产生之过程,理象显著之序,天地人物各具之功能,以及变化生生之缘由;卷三、卷四,主要阐述小世界身性显化之序,身心性命所藏之用,以及圣凡善恶之由;卷五则是说明大世界、小世界分合之妙理,浑化之经义,而归于一真。概而言之,全书阐述了真宰派生万物、人类,以及万物、人类复归于真宰的次第、过程。刘智认为人类复归的过程,更为精妙。因为,人类来自真宰并复归于真宰,是一个由有形而归于无形的过程。可见,人的复归真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是《天方性理》的核心问题。

刘智认为,人是由"身""心""性"三者构成,彼此既不可分离,又互有差别。因此,人复归真主需要从身、心、性三方面进行功修,即正身→清心→尽性,才能达到与主合一的境地,才能复归真主。当然,就人的"身""心""性"而论,心性最为重要。人有别于或高于其他物类不在其身,而在心性。人的心性之中,含有智慧、德性这两个最为根本性的因素,故而伊斯兰教功修的实质是让智慧与德

收稿日期:2014 - 03 - 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部地区涉及少数民族的群体事件研究"(11ASH003);南京理工大学科研项目"长三角地区外籍穆斯林社会生活与基层社区建设研究"(2012YBXM051)
作者简介:季芳桐(1954 -),男,江苏南京人,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史、江南穆斯林宗教信仰状况研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性的光辉发挥出来。由于心性之本源于真宰，是真宰派生而来。如此一来，宗教功修所追求的目标，实质上是充分发挥真宰赋予人的先天智慧与道德。换言之，只有一步一步（正身→清心→尽性）达到最高的层次，才能使智慧、德性的光辉充分发挥出来，才能复归真主。

通过上述探讨我们清楚了，刘智的《天方性理》涉及大世界与小世界，而重点在于小世界，即人类之心性。因为，人只有通过功修，达到“清心”“尽性”的境界以后，才能复归于真宰。既然心性是（通过功修）复归真主的最大依靠，自然成为《天方性理》探讨之主旨或核心。

《天方性理》中伊斯兰教学者的序文，亦可以证明上述观点。其一，袁汝绮的序文。袁汝绮是刘智的老师，据史料记载，袁汝绮曾教授刘智《古兰经》和阿拉伯文。其《序》曰：

> 造物主欲毕见其全体大用，而生人焉。则人也者，造物主之镜。镜明则见全，镜昏则见亏。是见全见亏，只在人之心镜明与不明尔。圣人本其至清至明之本然，无所不见，是以称浑同体用。贤则少差而望全知，则知其全。愚则并不知其全者也，其为体为用，则皆物欲，而非造物主之体用矣。圣人不常出。圣往，则贤知之徒，各用其知见。用之真，则所知所见皆真；用之伪，则所知所见皆伪。知见既伪，遂认私臆之体用，为造物主之体用矣。夫何僭妄之甚？是以终日言格物致知，卒未见其格致之效；终日言穷理尽性，究未成其穷尽之功[1]。

全文大意是，真宰希望世界能够看到其造化的全体大用，而派生出人类，人类犹如造物主之镜子。镜子若明亮所见则全，若昏暗所见则缺，是全还是缺，全在心性是否清澈、明亮。圣人本心至清至明，无所不见，能够与真宰的体用合而为一。贤者稍有差别，但仍有望通过学习达到全知的境界。愚者则不知其全体大用，其为体为用，皆出于物欲，而非真宰之体用。圣人是不常出现的，圣人未现时，贤者则各用其知见，用之真则知见皆真，用之伪则知见皆伪。一旦知见成伪，便以主观猜测之体用，为造物主之体用。世间还有比这更胆大妄为的吗？于是，终日格物致知，终究没见功效；终日穷理尽性，终究没获效果。

袁汝绮将心性比喻为明镜极为恰当，说明心性清澈明亮之重要。尽管文章没涉及自然万物复归与人类复归之差异，以及两者孰轻孰重，然序文一开首直奔主题，即只论心性以及格物致知，而不论其余。可见，其对“心性”重要性之认识与《天方性理》是相同的。否则，以此为序就显得不合适了。

其二，黑鸣凤的序文。黑鸣凤是刘智好友，曾为《天方性理》作序跋，为全书各章作注释，可谓深得刘智思想之底蕴。其《序》曰：

> 予武人也，易敢言性？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愚夫愚妇，不靳与知，不靳与能，顾予武人，奚可自弃？粤稽性学，肇自羲孔，嬴秦一炬，后学失征。……
>
> 吾教言性，本乎实有，归于一真；理有一定，言确可征。予不自弃，心窃好焉。幼攻章句，操觚未遂，更涉韬钤，屈轶场屋。追随扈侍，驰逐仕版，曾无余晷，不遑事斯，且传经籍，本自天方，音殊字异，辩析维艰。不独武人，莫窥涯涘，世出老耆，亦鲜知之。故予每意，安得吾教，卓荦杰出，会通翻译，发明精义；与世共证，俾益斯道。倦倦之念，甘载于兹。今幸白门，刘子介廉，既精西学，又通诸家，中西异同，灿若眉日。慨然任道，诠发性理，不伸甘苦，数十寒暑，纂译圣经，著为图传[1]。

黑鸣凤开首自谦道：我只是一位习武之人，怎么敢言性？上天生育万民，有制度有规程。就连愚夫愚妇都不吝惜自己的知与能，反顾自己，又岂能自弃？心性之学源于伏羲以至于孔子，秦始皇焚书之后，学者失去了所依之典籍。……我们伊斯兰教的心性之学，本于实有而归于真一，道理一定，言论准确而可以明证。我虽是军人，亦不自弃，喜好天方心性之学。幼年时，曾攻读文章诗句，然没能好好研读，便入军旅，官场奔波，难有闲暇。况且，伊斯兰教经典来源于天方，读音不同，字形相异，教义辨析起来非常困难。不单习武之人如此，就是硕学之士也知道不多。所以，常思：怎么才能求得我教诞生杰出人才？其人应该能够汇通回儒，发明心性学之精意，与天下共同证明，以利于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心性之道。此方念想，持续了二十多年了。今天非常幸运，刘智出现了，他既兼通中外之学，又能够慨然任道；而阐述心性之理，不畏艰苦，坚持数十年，译撰经典，附于图像等。显然，黑鸣凤序文之重点也在人之心性，而非其他。

在刘智的师友中，上述两位是最熟悉，也是最能理解刘智思想的。他们在撰写序文时，都不约而同地论及心性，甚至整篇序文，都围绕这点展开。显然，他们都认为，人之心性（包括功修而复归真主等）问题，是穆斯林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也是《天方性理》的主旨或核心。过去我们的研究，大多泛泛探讨天道观、人道观、认识论等，而对心性理论的研究则较少，更严谨地说，较为罕见。现在，若是仍停留于此，不再进行深入探讨，不再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实在不应该。

二

探讨《天方性理》之影响，自然应该考察其在主流社会里的影响，或者说其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天方性理》在康熙三十九年前完成①，由回族学者马子良转给当时的礼部尚书王泽弘作序。清朝的礼部是朝廷负责文化、教育、考试、外事的一个职能部门，尚书是礼部的一把手，相当于部长。礼部尚书（以及后来的礼部侍郎、兵部侍郎等先后）为其作序，说明朝廷或主流社会对其著作的认可，具有较强的权威性。王泽弘曰：

> 今天方之言性也，详而核，其言先天也，则天理之节文莫不条分而缕析之。其言后天也，则人性之品第莫不伐毛而②洗髓焉。天方言性固至于此，而刘子之心思才力固至于此哉！今之人刻鹊雕虫拉止此耳。刘子乃能以心思才力用之于至正至精，而不惑于乾竺、欧罗之说，亦大可敬矣！[1]

大意为：现今伊斯兰教讲心之道理，翔实而精确，其讲先天的道理，则天理的规则，莫不有条有理地细细分析；其讲后天的道理，则心性之品次，莫不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伊斯兰教讲心性之理，已到了这样精深的地步，而刘先生的心思才力，的确也达到这样的程度！现今，就连高超艺人刻鹊雕虫之技艺，也不过如此。刘智能以其才智用之于至精至正，而不为印度、欧洲的诸学所惑，实在太可敬了！

王泽弘接着说：

> 刘子、马子，世其家学，各遵其所闻，各行其所知，皆能与吾儒相为发明。相为补救。而刘子益虚心究学，会贯儒者之典，以日新其机而富有其业，则天方无书，自刘子而有书，吾儒绝学，有刘子而可与共学也已！岂非世道之大幸欤？[1]

刘（智）先生、马（子良）先生世代继承家学，各遵守其听到的，各奉行所知晓的。这些都能和我们儒家的学说互相阐发，互相补救。而且，刘先生又能虚心研究学问，融会贯通儒家的经典，以崭新的道理来丰富学业。以前中国并无汉文伊斯兰教的著作，自《天方性理》后而有之，我们儒家精绝之学说，能够与刘先生这样水准的人，一起共同切磋、研究，岂不是世间大幸！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序言非应景之作，是有感而发，尤其对于弥补儒家学说之类的评价，是客观、准确的。

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礼部侍郎徐元正也为其书作序：

> 天方去中国数万里，衣冠异制，语言文字不同形声，而言性理，恰与吾儒合。其言先天后大，大世界小世界之源流次第，皆发前人所未发，而微言妙义，视吾儒为详。不得于理者，见于图；不得于图者，见于文。两义发明，而天人之秘密、性学之根底，了如指掌焉！恍

① 据史料记载，王泽弘于康熙三十九年六月至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为礼部尚书，作序应在此期间。

② 伐毛雨洗髓，这段文句根本无法理解，查其手稿，应为“伐毛而洗髓”，即所谓脱胎换骨之意。由于原文是行草，所以“而”“雨”从字形方面看，常常会相混，今更正之。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忽肤浅之辈，复能拟议于其中乎？诸家横肆之说，当亦从此洗矣！作是书者伊谁？西方圣人创之于前，群贤宿传之于后；白门刘子汉译以授中国，中国将于是书，复窥见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则是书之作也，虽以阐发天方，实以光大吾儒。噫！吾不知刘子心胸何如辽阔，功业何如久远也！[1]

大意为：阿拉伯离中国数万里，衣冠礼制与汉地相异，语不同声，字不同形，而性理则与儒家相合，其言先天后天，大世界小世界之源流次第，皆发前人所未发；其含蓄的语言，精妙的义理，较之儒家更为详细。不见于理，则见于图；不见于图，则见于文。图文两方面相互阐发，而天人之秘密，心性学之根底，亦了如指掌。如此一来，那些恍惚肤浅之辈，再无法拟议其中；诸家专横放肆之说，亦将从此一扫而空。著作者是谁？西方圣人创造于前，群贤硕学传之于后，布衣学者刘智译成汉文而授予中国。中国见此书，则得以重新窥见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此书作者虽然以阐发伊斯兰教之义理，而实际上是光大儒家之道。啊！我不知道刘智心胸如此辽阔，功业如此久远。

上述两段序言，为两人所做，虽然彼此官位（实际上都是部级官吏）不同，撰写时间前后相差九年，阐述各有侧重，而评价却高度一致。《天方性理》涉及内容很广，而最为根本的、最为重要的是心性理论。正是这个理论以及功修的方式与儒家的伦理思想以及功修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甚至较之儒家更加翔实，故而“皆能与吾儒相为发明，相为补救”；“是书之作也，虽以阐发天方，实以光大吾儒”，并可由此“复窥见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这是其一。其二，非常赞赏刘智的学识。王泽弘认为，我们儒家精绝之学说，遇见像刘先生这样有学识的人，从而能够共同切磋、研究，这岂非人间之大幸！徐元正感叹道“噫！吾不知刘子心胸何如辽阔，功业何如久远也！”朝廷两位高官如此评价一位穆斯林学者以及著作，实为罕见。可见，儒家士大夫真正了解伊斯兰教教义之后，也是能做出客观的评价。补充一点，就是礼部尚书王泽弘序文说到一个情况“则天方无书，自刘子而有书。”按照这里的文意，应该是在《天方性理》之前，主流社会未见汉文伊斯兰教著作；自从《天方性理》开始，伊斯兰教的汉文著作才为主流社会所了解、知晓。其实，这句话确实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的实情①：刘智著作刊行以前，穆斯林社会虽然已经刊印了不少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诸如王岱舆、张中等人的著作，问题是它们并未被主流社会所了解、所知晓，故而大家以为它们并不存在。为何出现这样的状况？笔者以为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伊斯兰教学者虽然译撰了一些著作，但大多不太愿意向教外人传播，也不愿与非穆斯林交流；另一方面，在当时主流社会环境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屏障，“屏蔽”了伊斯兰教的思想、著作。总之，上述两方面因素，使得主流社会对于伊斯兰教学说、思想几乎是两眼一抹黑，以为中国并无此类论著。刘智在完成著述之后，前后请三位朝廷高官作序，这一看似无意之举，却获得巨大效果：冲破了社会的无形屏障，成功地将伊斯兰教教义传入主流社会。所以，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非常自信的事情。试想，若是没有对于伊斯兰教教义的高度自信——即我教的心性理论与儒家理学相比各有千秋，非但不逊色反而有过之——绝对不会轻率地请人作序。以此为机缘，儒家士大夫和主流社会才开始了解伊斯兰教的思想理论，才开始感觉伊斯兰教理论是一种非常精深的，与儒家思想学说有许多相近、相似之处的理论。所以说，刘智《天方性理》的价值或功效非同寻常，其开拓作用和意义也绝非其他著作可比。

或许某些学者不以为然，以为伊斯兰教的教义，无须外人理解。因为，外人是否理解，对于教义

① 形成这样的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发行渠道问题。虽然穆斯林学者的汉文译著刊印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崇祯年间，然而发行、流通范围局限于穆斯林群体，故教外人士不易接触到这些著作。二是穆斯林学者心理感觉问题。当时穆斯林学者的关注重心是教内，撰写著作是为了向穆斯林传授教义。他们不愿意，也不主动向教外汉民，包括朝廷传播伊斯兰教的学说、思想。三是主流社会对于其他民族文化的忽略。主流社会的知识精英或者说儒家学者，皆具有汉文化优越感，对于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不甚关心。换言之，你若不送来请其审阅，他是绝对不会主动阅读的。如此一来，彼此之间非常生疏。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存在与发展，并无直接关系。当然，若狭隘地看，伊斯兰教的理论或教义，可以不依赖教外人士而独立存在。然而，这样的状况毕竟不利于伊斯兰教的传播。此外，伊斯兰教理论可以独立存在、发展，然中国的穆斯林并不能离开主体民族而孤立地发展。既然不同民族生活在同一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彼此熟悉、了解，总比陌生、孤立好。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从多民族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的总趋势来看，不同民族生活在一起，熟悉彼此的生活习俗、行为方式、宗教礼仪等，仅仅是初步的交流；而知晓彼此的内心，理解彼此的内在精神，才是真正深入的交流。换言之，主流社会若想理解穆斯林的内心、精神，对于其根本信仰伊斯兰教教义的认识或理解是必需的，不可或缺的。而刘智的汉文著作，包括《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等，恰恰是帮助人们正确理解伊斯兰教教义，正确理解中国穆斯林行为规范的重要指南。所以，其价值或意义极为重要。

目前，研究族群冲突与矛盾化解的学者认为，误解、偏见是族群矛盾的导火索；沟通、了解是消除误解和偏见的有效方法，也是民族和谐的最佳途径之一。所以，《天方性理》能在主流社会中发行并被认同，实际上也为汉民族与穆斯林民族之间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源和支撑。

三

上文主要探讨了《天方性理》对于主流社会的价值和影响，这里需要阐述一下，其对伊斯兰教内部和穆斯林的影响。由于著作的出版主要是面向中国的穆斯林，所以这方面的影响尤为重要。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伊斯兰教著作的流通，基本依靠穆斯林内部的渠道。其主要是依托于清真寺、商业贸易以及信众、学者的外出游学。如人所知，清真寺既是回民礼拜的场所，也是伊斯兰教文化交流的场所，这种格局至今未变。所以，古今伊斯兰教书籍大多通过各地清真寺这个渠道而向外传播、流通。其次，回民善于经商，贸易活动使他们走南闯北，足迹遍及全国大小城市。回民外出时，往往是人到某处，便会将书籍带至某处。换言之，书籍是随着贸易人的行走而流通。此外，穆斯林外出游学比较普遍，或是为了交流学术观点，或是为了学经等，每到一处自会携带一些书籍。如此一来，不同地区的著作也就随之传播开来。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的海富润案[①]便是例证。实际上，这个案例很简单：广东海南人海富润外出学经，返回家乡途经广西时，因携带伊斯兰教书籍而被抓。经过审讯发现，海富润本是崖州（即海南三亚）人，在外地学经九年，到过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省。每个地方都逗留了一段时间，而在陕西逗留时间最长。学经返回时，携带的伊斯兰教经典，主要是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也有一些汉文的典籍，而汉文典籍，又以刘智的著作为多。问题是海富润并没来过江宁（南京），从何处获得刘智著作？经查，书籍是南京在湖北做贸易的回民袁氏赠送的。这一案例使得我们清楚：或是通过贸易，或是通过游学，刘智的著作在乾隆年间已经流通至湖北。需要说明一下，回回通过贸易、清真寺、游学，交流书籍的情况很多，只是作为司法案例比较罕见，故史料记载比较清晰。

总之，上述种种渠道构成了一个网络，这既是穆斯林社会联系的网络，也是伊斯兰教书籍流通的网络。由于此类网络的存在，不同地区穆斯林之间的联系、交往变得更加方便。刘智《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正得益于此，而流通至全国。

当然，最能证明《天方性理》流通于穆斯林中的例子是同治年间的一份奏折。清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左宗棠参与镇压。大致在同治十年（1871 年），左宗棠给朝廷一份奏折，论及刘智著作《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在穆斯林尤其在西北穆斯林中流传的情况：

> 今回民称天方教，自称曰穆民，以尊穆罕默德故也；又曰膜民，以阿丹初生之祖言也。其书有《天经》一部，回族称为穆罕默德所受之天者；又《天方理性》《天方经典》两部，则

① 海富润因携带伊斯兰教经典而在广西被抓。广西巡抚朱椿，一面上奏乾隆皇帝，一面飞咨相关的各省查拿相关人员。但乾隆却认为不应查办，连发上谕向地方督抚作出指示，于是事件又很快平息。参考杨晓春论文。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明代金陵回人刘智所撰，皆发挥《天经》遗意，以华人文字润色之。其教以识主为宗旨，似儒者所言明心见性；以敬事为工夫，似儒者所言制外养中。[2](45)

大意是：现今回民称自己的宗教为天方教，信众自称为穆斯林或穆民，因尊敬穆罕默德之故也。他们以亚当为始祖，在教内有一部经典《天经》（即《古兰经》），穆斯林认为这是真主授予穆罕默德的；同时，又有两部书《天方性理》《天方典礼》。这是南京回回学者刘智所撰，是发挥《古兰经》的思想，以汉文撰写并润色之。伊斯兰教以识主为宗旨，有似儒家所说的明心见性；以敬事为工夫，近似儒家的治外而养中。

这里暂不论其奏折的其他内容，也不论其对回、儒的比附是否恰当，仅就奏章所言——回回有一部经典《古兰经》，两本著作《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可知，在同治年间，刘智的著作已被西北广大穆斯林所收藏。当然，左宗棠所言不可尽信，他毕竟是回民起义的镇压者，是朝廷派来的大员。料想在西北回回中一定藏有更多的伊斯兰教书籍，诸如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伊斯兰教经典等。须知陕西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中心地，是陕西学派的发源地。因此，奏折中所列书籍的种类，一定少于实际。当然，也不可因此否定奏折所言：中国穆斯林普遍具有《古兰经》《天方性理》《天方典礼》这三部书。如此看来，刘智的著作自刊行以后，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和者盖寡”，而是和者众多，影响甚广。

除去朝廷官吏奏章之外，从西部穆斯林的一些资料中，也可以发现刘智著作的影响。西北穆斯林不以著述见长，然而确有言论证明，他们对刘智思想的认同。例如哲合林耶的马明心。马明心（1719～1781年），是西北四大门宦之一哲合林耶的创始人。在世时，学生百余人，著名阿訇六十余人[3](367)，信众更多。总之，他是一位有影响的教派领袖。马明心曾期许道“介廉（刘智）栽花，我结果。”[3](289)其言行通过弟子，在西北广泛传播。该派七辈教主马元章，在复兴教派活动中，也“接受刘介廉思想，强调用汉文宣传教义，用儒道之学，解释宣传伊斯兰教，又运用儒家忠义之道建立哲合林耶门宦教权制度”[3](314)。此外，马元章、马元超兄弟还为刘智墓题写“道学先觉”①，以表达对刘智先贤的敬仰。又如西道堂的马启西先生。马启西（1857～1914年）是西道堂的开创者，是位秀才出身的教派领袖，或者说，是一位对儒学也有造诣的穆斯林。马启西说“介廉种籽，关川（哲合林耶道统发祥地，今甘肃定西市境内）开花，我要结果。”[3](122)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临潭旧城开设经堂，正式讲学传道，宣讲刘智等人著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五功释义》《归真总义》《清真大学》《清真指南》等[3](119)。以后，西道堂一直继承着马启西的这个传统。再如云南穆斯林学者马复初（1794～1874年），曾对刘智的《天方性理》做过注释，即《天方性理注释》[5](1074)。以后，云南的马联元在撰写《辩理明证语录》时，大量引用刘智的著作，该文有关儒家、佛教、道教之述评，全源于刘智的著作。此外，他还将《天方性理》本经翻译为阿拉伯文，名为《性理微言》[5](1079)，成为中国学者首部被译为阿文的伊斯兰教著作。

总之，从朝廷大员的奏章以及穆斯林社会内部的史料（虽然零碎，但亦能由点及面，汇聚成穆斯林社会的整体面貌），可以断定刘智《天方性理》最迟在清同治年间，已由金陵传至全国，已由一般学者传至普通穆斯林大众中。随着刘智著作的流通，其声誉也越来越大，“介廉巴巴”“道学先觉”的称呼，亦传至全国。

学界一般认为，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活动是王岱舆开其端，此阶段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及汉文译著，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张中的《归真总义》、马注的《清真指南》、马复初的《大化总归》等等。他们在理论方面都有许多独创之处，都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为何刘智的著作能够在穆斯林中间获得独一无二的地位？换言之，为何刘智著作流通这么广泛，认同度这么高，不少学者为其作注，并将其翻译为阿拉伯文？笔者认为，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应该注意，刘智著作能够将教义的精深

① 见南京刘智墓碑。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性与通俗性相结合。这是其独特优势,无人可比。例如刘智对于心性的阐述,其精深程度达到极致,就连儒家学者自叹不如,并认为儒家的心性理论的精深不及于此。为了方便普通穆斯林信众的理解,刘智在著作中又附于大量的插图。这种图文结合的方式,大大方便了一般信众的理解,达到了深刻性与通俗性的统一。这种独创的撰述方式,从目前伊斯兰教的著述情况来看,可谓空前绝后。过去有的学者以为深刻与通俗是一对矛盾:深刻则难以通俗,通俗则无法深刻。其实,这是误解。刘智的著作使我们清楚,深刻与通俗,彼此之间非但没有矛盾,而且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

此外,在《天方性理》中,系统性、理论性、动态性,这三者达到了非常完美的结合。其完美程度,尚无出其右者。其实,明清之际的汉文伊斯兰教著作,都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理论性,但是动态性则未必,而《天方性理》恰恰是动态性非常强。最典型的例证是,关于天地万物、人类生成而复归的过程。刘智指出:是"真一"派生"数一",继而创造世界万物、人类;人类又通过("教乘""道乘""真乘"等)修归于"真一"。这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过程。《天方性理》高明之处在于,以动态方式将世间来源于真主而又归于真主的循环,描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确实是一大创新。我们决不可轻视这种动态性的阐述,因为真主的创造性,以及人类回归的能动性,只有通过这样动态的发展,才能充分显现出来。于此可见,动态过程的阐述是亟须功力的,而这种造诣绝非一般思想家所能达到。自然,刘智的成功还有其他因素,然而无论怎么看,其中含有的种种必然性使得《天方性理》在历史长河中,越传越广,延绵不断。

目前,学者研究明清伊斯兰教史时,大多认为这个历史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家和汉文著作,当然不错。可是,这仅仅是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即从广度来看问题,若是从高低层面看,则是观察问题的另一角度。从后一角度看,可以发现刘智所处的地位目前尚无超越者。换言之,若是我们将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喻做一座座高山,那么刘智正是高山群中的山峰,而阅读《天方性理》,便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

参考文献:

[1] (清)刘智.天方性理·序[M].续修四库全书本.

[2] (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五)[M].长沙:岳麓书社,2009.

[3]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与门宦制度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4] 金宜久.伊斯兰教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

[5] 白寿彝.中国回回民族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责任编辑　马明德】

Theme of *Dispositions and Principles of Arab Countries*(*Tianfang Xinli*) by LIU Zhi and Its Influence

JI Fang-t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Dispositions and Principles of Arab Countries by LIU Zhi probed into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of which discussed the worship by thoughts to understand the return to Allah. Since the book was published, it was widely spread and read by both scholars and Muslim civilians, which achieved wide identity, both because of its deep insight-ment, dynamic meaning and popularity, and embodied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Islamic studies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LIU Zhi; *Dispositions and Principles of Arab Countries*; Disposition; Hui Confucianism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